



# 昨日世界

——茨威格自传

[奥地利] 斯蒂芬·茨威格 / 著  
葛从卉 /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昨日世界 茨威格自传



(奥地利) 斯蒂芬·茨威格 著

葛丛卉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昨日世界: 茨威格自传 / (奥) 斯蒂芬·茨威格著;  
葛丛卉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594-078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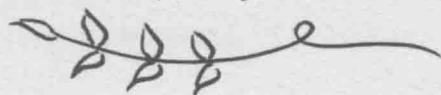
I. ①昨… II. ①斯… ②葛… III. ①茨威格  
(Zweig, Stefan 1881-1942) — 自传 IV. ①K835.2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5786 号

书 名	昨日世界: 茨威格自传
著 者	(奥) 斯蒂芬·茨威格
译 者	葛丛卉
责任编辑	袁 媛 王宏波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a href="http://www.jswenyi.com">http://www.jswenyi.com</a>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783-2
定 价	36.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序言	001
第一章 一个太平的世界	006
第二章 上世纪的学校岁月	024
第三章 情窦初开	049
第四章 大学时光	064
第五章 巴黎，永葆青春之城	086
第六章 成长的曲折道路	109
第七章 走出欧洲	121
第八章 笼罩欧洲的光明和阴霾	131
第九章 1914年战争最初时刻	145
第十章 为思想上的团结而奋斗	160

第十一章	在欧洲的中心	171
第十二章	返回奥地利	187
第十三章	重返世界	201
第十四章	夕阳西下	217
第十五章	希特勒的崛起	240
第十六章	和平的垂死挣扎	262
后记		294

## 序言

我从未把自己看作是什么大人物，有想要告诉别人自己故事的欲望。在我有勇气写一本以自己为主人公，或者以我为中心的书之前，发生了许多事情，无数的事件、灾难、考验，远远超过了一代人所能经历的。我能想到的就是利用好这一优越的历史位置，充当一位图文并茂的讲述人。时代提供了画面，我只是为这些画面配上了文字。事实上，我叙述的不仅仅是我自己的遭遇，更是我们整整一代人的遭遇——历史上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样命运坎坷。我们这一代的每个人，即便是年龄最小、最微不足道的人，内心深处也被我们欧洲大陆上几乎从不间断的“火山爆发”所震撼。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我知道无权自称杰出，但我具备别人没有的优越条件：作为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文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我始终身处在“地震”最猛烈之处。三次“地震”彻底摧毁了我的家园和生活，把我与过去割裂，以极大的力量把我抛入一片空虚之中，落入“我不知道何去何从”的境地，而对这种境地我是如此地熟悉。但是我不懊悔，因为如此无家可归的人才能获得一种全新意义的自由，只有那些失去了所有外在联系的人才不会有任何顾虑。因此，我希望这本书至少能够满足一部能够较好地描绘一个时代的作品所具备的一个主要条件：如实且不偏不倚。

确实以往很少有人像我一样，被迫与自己的根、成长的土地分离。我于1881年出生在一个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强大帝国。不过现在你在地图上找不到它，它已经彻底被抹去了，了无痕迹。我在维也纳长大，一座有着两千年历史、做过列国都城的城市，然而在它沦为德国一座省城之前，我被迫像罪犯一样离开。在同一个地方，我用母语创作的文学著作被烧成了灰烬，也正是在那里，我的书与数以百万的读者成为了朋友。所以我不属于任何地方，所到之处我都是一个陌生人，充其量不过是个过客。即使作为我心之所属故土的欧洲，在第二次同室操戈的战争中毁灭性地四分五裂之后，于我已经不复存在了。我见证了有史以来理性最可怕的败退，以及残暴在时代的编年史上取得最疯狂的胜利，这并非我所愿。从未有任何一代人像我们一样经历了道德从一个如此高的精神高度倒退——我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任何自豪感，而是出于羞耻。从我第一次长出胡子到现在我的胡子开始变得花白，这短短的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发生了太多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十代人经历的都要多。我们这代人都觉得：这未免太多了！今日和昨日，起起和落落，它们是那么的不同，以至于我有时觉得自己似乎不止活了一次，而是好多次，每次都是不一样的。这种错觉经常发生，甚至当我无意中提起“我的生活”时，我扪心自问是我的哪一种生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生活、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生活，还是今天的生活？同样，我发现谈到“我的家”的时候，起初并不知道指的是哪个家，是在巴斯的家、在萨尔茨堡的家，还是在维也纳的我父母的家？或者说“我的同胞”时，我必须沮丧地承认：对于故乡的人们，很长时间以来我早已不算是他们中的一员了，就像我算不上英国人或美国人一样。前者与我不再有有机的联系；至于后者，我从未完全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我觉得我成长的世界、当今的世界以及二者之间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每当与年轻的朋友交谈，追述一战之前经历的时候，从他们冒失的问题中我发现，多少对于我而言鲜活的事实，对于他们已经变成了历史，难以理解。某种神秘的直觉告诉我他们是对的。所有连接我们今天、我们昨天和我们过往岁月的桥梁已经分崩离析。

我自己也不由得感叹时代把多样且丰富的生活压缩在一代人身上，尤其是当我把这种危险而且不堪的生活与祖先们的生活方式作比较的时候。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他们见识过什么？他们的生活具有统一性，

是一种从头到尾都很简单的生活。没有升腾也没有衰落，不受干扰也没有危险，存在些许焦虑和令人察觉不到的渐变。在舒缓的节奏中，从容而安静，时间的浪潮将他们从摇篮送至坟墓。他们从出生到去世都居住在同一个国家，同一座城市，甚至几乎都在同一所房子里。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只存在于报纸之上，从没有降临在他们家门口。在他们生活的时代也发生过一些战争，但是仅限于个别地方，以当今的战事衡量仅称得上是小打小闹。开战的地方远在千里之外，人们听不到炮声，六个月后也就结束了，被人遗忘，成为历史上干瘪的一页，人们又开始按部就班地生活。但是生活在我们这代人中没有重复；过往的一切都消失殆尽，回不去了。我们这一代人最大限度地饱尝了历史以往会不时分配给一个国家、一个世纪的一切。以前，充其量一代人经历了革命，下一代人遇到了起义，第三代人遭受到了战争，第四代人碰到了饥荒，第五代人经受了国家破产。还有许多得庇佑的国家，幸运的几代人，没遭过任何灾受过任何罪。然而，对于我们现在60岁的这代人和比我们年长一些的人，难道还有我们没见过、没经受过、没挺过来的事情吗？我们已经反反复复饱尝过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灾难，而且灾难还尚未尝尽。我自己经历了人类历史上两次最大的战争，甚至每次都属于不同的阵营，一次支持德国，另一次反抗德国。战争之前我享受到了最充分的个人自由，之后体会到了数百年间最严重的不自由。我被颂扬过也被蔑视过，自由过也不自由过，过过富裕的生活也饱尝过贫穷。所有《约翰启示录》中青色的骏马<sup>[1]</sup>都曾闯进过我的人生——革命、饥荒、通货膨胀、恐怖、瘟疫、流亡。我亲眼见证过大量意识形态的萌芽、发展、蔓延——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特别是国家社会主义，像瘟疫一样危害极大，毒害了我们欧洲的文明之花。我不得不沦为无力反抗、无能为力的见证人，目睹了由于反人道主义蓄意计划的教条，人性堕落到了最难以想象的野蛮之中，而这种野蛮我以为早已被人遗忘。几百年后，注定由我们再一次亲历没有宣战的战争、集中营、迫害、大规模抢劫、对不设防城市的狂轰乱炸，这些是过去五十代的前辈都不曾知晓的兽行，但愿不要再发生在后代的身上。但是，与此矛盾的是就在同一个时代，当我们的世界道德后退一千年的时候，我发现在

[1] 《约翰启示录》中四匹马分别象征瘟疫、战争、饥饿、死亡。



技术和知识方面取得的成就，完成了闻所未闻的发明，一跃超过了过去一百年。发明飞机征服了天空，在一秒中人类的语言能传到地球的另一端，征服了空间的距离，原子的裂变治愈了最可怕的疾病，几乎每天都在实现昨天看来不可能的事情。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的时代那样，作为整体的人类既有着恶魔般的行径，同时又像神一样取得那么多的成就。

为我们这紧张而富有戏剧化，充满未知的生活作见证似乎是我的职责，因此我重申：每个人都是这场巨变的见证人，而且是迫不得已的。我们这一代人无路可逃，不能像过去一样置身事外。由于同时性的新机制，我们始终和时代休戚与共。当炸弹将上海的房子变成废墟，在伤者被抬出来以前，我们身处欧洲的房间里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大洋彼岸数千英里以外发生的事情以画面的形式完整地映入我们的眼帘。对于不间断地联系和介入，也就没什么可以获得保护的地方了。无净土可寻，无安宁可买。命运之手会随时把我们抓牢，拖回其永不知足的耍弄之中。人一直不得不屈从于国家的需要，充当最愚蠢的政治牺牲品，来适应最怪异的变更。个人总是被集体命运所束缚，尽管他苦苦拒绝，还是被裹挟，无力反抗。任何从头到尾经历过，或者说被时代纠缠、驱赶的人，比先辈们的阅历都要多——我们喘息的机会少之又少。今天我们又一次站在转折点上，是又一次的结束和新的开始。在这个确切的日子结束我对过往生活的追忆，并非没有深意。因为1939年9月标志着锻造和教育我们这些六十岁左右人的时代最后的辉煌时刻。但是，如果我们的见证可以给下一代人留下我们那个时代衰亡的真实情况，哪怕是一丁点，我们的付出也算没有白费。

我清楚地认识到我是在不利且极具我们时代特征的环境下记下我的回忆的。我是在战争期间，身在异乡，没有任何能够帮助我回忆的资料的情况下，写下了这些回忆。在我旅馆的房间中找不到一本我的书、一份笔记、一封朋友的信件。我也无处可以寻获消息，全世界各个国家间的邮寄服务都被审查机构中断或阻隔了。我们彼此之间失去了联系，就像几百年前没有发明轮船、铁路、飞机，也没有邮递服务的时候一样。过去的一切之于我只是脑海中残存的记忆。此刻，记忆之外的其他东西都找不到或者遗失了。但是我们这一代已经完全学会了一门不错的艺术：对逝去的一切不再怀念。或许，文献和资料的丢失对于我写的书来说是——一大优势。因为记忆之于我不是偶然地记得或忘记的东西，而是一种有

意识编织和精细筛选的能力。已经忘记的生活，本来就是内在的本能注定要忘记的。只有那些自己愿意保留的记忆，才是为他人保存下来的。因此，记忆，你们做出选择为我开口吧，至少在我的人生完全被遗忘之前，说点什么呢！

## 第一章 一个太平的世界

我们在一片安谧中长大成人，  
忽然被投进这大千世界，  
无数波涛从四面向我们涌来，  
我们对一切都感兴趣，  
有些我们喜欢，有些我们厌烦，  
而且时时刻刻起伏着微微的不安，  
我们感受着，而我们感受到的，  
又被各种尘世的扰攘冲散。

——歌德

如果需要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成长的日子做一个简单地概括的话，我希望是“黄金的和平时代”，这一叫法传达出了那个时代的充实和丰富。在有着近一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君主国好像所有的事情都会天长地久下去，而国家本身就是这种稳定性的最高保障。公民拥有的权利由议会授予，议会是自由选举产生，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且对每项义务都有明确的规定。我们的货币——奥地利克朗，是明亮的金币，这确保了它的永恒性。每个人对自己拥有的财产、享有的权利、能干什么、不

能干什么都有着清楚的认识。准则无处不在，事物都有确定的尺寸和重量。有财产的人都可以准确地计算出他的年收益，公务员或者军官可以安心地在日历上找出哪一年他可以得到晋升，哪一年他可以获发养老金。每户人家都有自己固定的预算，知道用于租金、食物、度假和应酬的具体数额。另外，一般还会留出一小笔钱，未雨绸缪，留作生病时支付医药费以及发生意外时使用。自己有房子的人会把房子当作自己孩子、孙子稳稳当当的永久居所。房产和生意都是代代相传。当婴孩还在摇篮里的时候，就已经为他在储蓄罐或者储蓄所里存下首笔少量的钱，作为未来的“储备金”。在这个庞大的帝国里，凡事井然有序，固守陈规。统治者是位年迈的皇帝，一旦他去世，人们认为（或者坚信）会有另一个新皇帝继位，秩序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没人想过会有战争、革命或者叛乱。在这个理性的时代，似乎所有激进的、暴力的事情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享受太平是数百万人梦寐以求的财富，是他们共同的生活理想。只有拥有这样的太平世界，生命才变得有价值，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分享太平世界这一珍贵的财富。起初只有富人能够享受这一特权，慢慢地老百姓也努力争取到了。于是这个太平的世纪成为了保险业的黄金时代。人们为房子投了火险和盗窃险；给农田投了冰雹和暴雨险；给自己投了事故险和人寿险；为防老给自己购买了养老金；小女孩尚在摇篮的时候，已经为她买了一份保险作为将来的嫁妆。最后甚至工人们都组织了起来，争取到了标准工资和劳工补偿。仆人们攒钱购买养老保险，预先向葬礼基金存入一笔钱作为自己去世后的丧葬费。只有那些对未来无所顾虑的人才能够尽情地享受当下。

虽然这种人生观得体又谦逊，然而在这种以为可以保护自己免受任何厄运侵袭的动人自信下面，隐藏着一种严重并且危险的自大。十九世纪是笃信自由理想主义的时代，人们真诚地相信自己正一往无前地走在康庄大道上，前方终将通向最美好的世界。以往的世纪因为充满战争、饥荒和暴乱，被鄙视为人类尚未成熟开化的时代。但是彻底消灭邪恶和暴力的最后残余也才不过是几十年前的事情，这种对持续和不可抗拒“进步”的信念确实对于那一代人有着信仰般的力量。人们对这种“进步”的信任甚于圣经，它的教义似乎是终极的，因为每天科学技术都会创造出新的奇观。事实上，在这个和平的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进步变得更加显著、迅速和多样化。夜晚，以往昏暗的路灯被电

灯所取代，商店那诱人的亮光可以从大街延伸至城市的边缘。由于电话的出现，人们可以和在远方的人通话。人们坐的车不再用马拉，以全新的速度飞驰。人们在高空翱翔，实现了伊卡洛斯<sup>[1]</sup>的梦想。舒适不再是高级住宅的专利，已经进入到中产阶级的家里。不再需要从抽水机或者水渠里取水，也不需要费力地在壁炉里生火。到处讲究卫生，污秽不再。人们参加运动强健了身体，变得越来越漂亮、强壮和健康。街上的跛子、残疾人和有甲状腺肿的人日益少见。所有这些奇迹的产生都有赖于科学，科学是进步的天使。社会事务也不断进步，每年都赋予个人新的权利，司法越来越温和与人道。即便是问题中的问题，即老百姓的贫困问题都不再显得无法克服。越来越广泛的阶层享有选举权，这样就有可能通过合法手段保护他们的权益。社会学家和教授们竞相为无产阶级创造更健康、更幸福的生活条件。无怪乎，本世纪把自己暴晒在取得的成就之下，视每个已完结的十年为下一个更好的十年的序曲。人们不大相信像战争这种野蛮的堕落会在欧洲各国之间爆发，就像不相信还有女巫和野鬼一样。我们的父辈坚信宽容与和解具有万无一失的约束力量，这让他们觉得很舒服。他们真诚地相信国家和派别之间的分歧和界限终将逐渐消融在共同的人性之中，人类将共享最崇高的财富——和睦和太平。

很早已经把“安全”作为神话从字典中勾除的我们，有理由对那些被理想主义蒙蔽双眼的一代人一笑置之，他们抱有人类科技的进步一定隐含着绝对的并且道德会同速度上升这一乐观的幻想。作为新一代的我们，已经学会了对任何兽性的发生习以为常，每一天都料想事情会比前一天更糟，所以明显对人类可能的道德进步持有更加怀疑的态度。我不得不同意弗洛伊德的观点，对他而言我们的文化和文明只是薄薄的一层，随时可能被“地下世界”的摧毁力量所刺穿。我们不得不慢慢习惯于在没有立足之地、没有公义、没有自由亦没有安全的状态下生活。很早以前，我们已经为了自己的生存否定了父辈认为人性会迅速并不断提高的信仰。我们见证了灾难如何突袭并且使人类人性上的努力倒退一千年，这使我们得到了惨痛的教训，对我们而言，轻率的乐观显得迂腐。

[1] 伊卡洛斯：Icarus，希腊神话中代达罗斯的儿子，与代达罗斯使用蜡和羽毛造的翼逃离克里特岛时，他因飞得太高，双翼上的蜡遭太阳融化跌落水中丧生，被埋葬在一个海岛上。为了纪念伊卡洛斯，埋葬伊卡洛斯的海岛命名为伊卡利亚。

但是尽管我们的父辈为之献身的仅是幻想，那也是美好的高尚的幻想，比我们今天的口号要人性得多、有益得多。所以如今我内心还是无法完全放弃那种幻想，尽管之后我对此有了清醒的认识，并且失望透顶。一个人在童年深深渗入其血液的时代气息是根深蒂固的。无论每天耳边响起什么振聋发聩的声音，无论我和无数与我同命运的人经历了怎样的考验与磨难，我无法完全否定年轻时的信念——终有一天一切会好起来的，尽管历经了那么多挫折。甚至在今天拖着扭曲而破碎的灵魂在绝望的深渊，像半个瞎子一样摸索的时候，我仍旧不断地仰望那些闪耀过童年的明星，并用继承而来的信心安慰自己：这种崩溃有朝一日终将只是永恒的不断前进的节奏中的一种间歇。

今天，大风暴早已将世界弄得粉碎，我们才最终明白太平的世界仅仅是梦幻的城堡，我的父母居住在里面，仿佛它曾经是石头造的。未曾有什么风暴，或者凛冽的风搅扰到他们温暖舒适的生活。诚然，他们有抵御时代风暴的保护措施：他们是富人，是逐渐变得富有的，甚至可以说非常富有，这使得他们可以在那个时代填补墙壁和窗户上的裂缝。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于我而言是典型的所谓“上流犹太资产阶级”，为威尼斯文化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而得到的回报却是被迫背井离乡。在讲述他们宁静而舒适的生活的时候，事实上我也是不带任何个人色彩的：一到两万像我父母一样的人生活在维也纳，生活在那个有着可靠价值的上世纪。

我父亲的祖籍是摩拉维亚<sup>[1]</sup>，犹太人聚居在小乡村中，与当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和睦相处。他们完全没有加利西亚<sup>[2]</sup>人和东方犹太人那种自卑感和自然带有的急躁。由于生活在乡间，他们身体强壮有力，像家乡的农民一样大步穿梭于农田间，他们安静笃定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他们很早就脱离了正统宗教，成为了当时最流行宗教——“进步”的热情追随者。在政治上奉行自由主义的时代，他们是最受尊敬的议会代表的支持者。当他们从家乡举家搬到维也纳的时候，他们以惊人的速度使自己适应了上流文化圈，他们个人的发迹与整个时代的普遍崛起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这种转变中，我们的家族也是典范。我

[1] 摩拉维亚：Moravia，捷克东部一地区，得名起源于该区的摩拉瓦河。

[2] 加利西亚：Galicia，中欧历史上的一个地区名，现在分别属于乌克兰和波兰。

的祖父是一位纺织品商人。本世纪的下半叶，工业化转变的潮流最早兴起于奥地利。从英国进口的织布机和纺纱机，由于合理化操作，与传统的手工纺织相比，价格出现了大幅下降。由于他们极具商业头脑和国际化眼光，是犹太商人首先在奥地利认识到转变为工业化大生产的必要性和优势。通常依靠有限的资本，他们迅速地建立起简易的工厂，起初运转仅靠水力，后来慢慢发展成为强大的波西米亚纺织产业，控制了整个奥地利和巴尔干半岛。如果说我的祖父是初期从事成品贸易的典型代表，那么我的父亲则坚定地迈进新世纪，在他三十岁的时候创办的北波西米亚一家小纺织厂，经过多年有条不紊地发展，逐渐成为了一家颇具规模的企业。

尽管形势发展的很诱人，但谨慎的扩张是完全符合那个时代的。另外，也彰显出了我父亲稳健、一点儿也不贪婪的性格。他信奉他那个时代的信条——“安全第一”。对他来说似乎凭借自己的资本拥有一份“可靠的”（那个时代另一个深受青睐的词语）产业，比依靠银行贷款和抵押扩建成一家大企业更重要。他生前最引以为傲的事情就是他的名字从未出现在任何银行本票或者汇票上，而在他的银行，不用说是最安全的银行——罗斯柴尔德银行，他的账户总是列在分类账中贷方一栏。任何带有一丁点儿风险的获利行为都是违背他原则的，多年以来他从不涉足他人的生意。即使这样他仍旧渐渐富有起来，这不是源于轻率地投机亦或是颇具远见地经营，而是依靠他使自己适应了那个谨慎年代的惯例，即花销只是收入极小的部分，这样每年都可以拿出一大笔钱来补充资本。像他同辈的大多数人一样，他视那种肆意挥霍掉一半收入却不“想想未来”的人为不可靠的废物——“想想未来”是太平年代的另一个关键词。由于财富的不断积累，在这样一个日益繁荣的年代，国家从未想过侵占，哪怕是最富有的人的一丁点儿收入。另一方面，国家和产业债券带来了高回报，富人只是被动地变得富有。然而，这是值得的。因为当时还不像之后的通货膨胀时期那样，勤俭节约的人遭到抢劫，本分老实的生意人被欺诈。在当时那些有耐心、不投机倒把的人赚的最多。因为父亲遵行了他那个时代盛行的惯例，在他五十岁的时候，即使是按照国际标准，也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富豪了。但是我们的生活水平并不能与一直迅速增长的财富保持一致的步调，我们的舒适感是慢慢增加的。我们从小房子搬到一栋较大的房子，只是在春天的时候我们才

会为下午出行租用一辆马车，外出旅行也只是乘坐二等车厢。直到父亲五十岁的时候，他才允许自己奢侈一回，和母亲在尼斯<sup>[1]</sup>待了一个月过冬。享受财富的原则是拥有它而不是炫耀它，这条原则一直不变。尽管是个百万富翁，父亲从未抽过一支进口雪茄，而是像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抽廉价的“弗吉尼亚”雪茄一样，他一直抽政府专卖的“特拉布克”，一种流行的方头小雪茄。玩牌的时候，也总是下很小的赌注。他坚定地持守着自己舒适、谨慎以及克制的生活方式。尽管与大多数同行相比，他更有教养、更体面——他弹得一手好钢琴，写得一手好字，会说法语和英语。他固执地拒绝接受任何荣誉、担任公职，终其一生，他从未寻求或接受过任何头衔或身份。尽管作为一位大工业家，这些都是唾手可得的。他从未向任何人索取过什么，也从没有义务向任何人说过“请”或者“谢谢”。这是他隐秘的骄傲，对他而言比任何外界的认可都要重要。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不可避免的有那么一个时刻：当凝视自己的时候看到了父亲的形象。现在父亲所坚持的那种不爱出风头，默默过自己日子的生活方式，日复一日，越发在我自己的身上显现出来。尽管它与我的职业是相背离的，因为某种意义上，我的职业需要博得名气，抛头露面。正是出于和父亲一样的那种隐秘的骄傲，我向来拒绝接受任何外界的荣誉，我从未接受过一枚奖章、一项头衔、担任过任何协会的会长，也没有加入过任何学会、委员会或评判委员会。仅仅坐在宴会的餐桌旁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折磨。一想到要求别人做什么，即便是为了第三人，话未出口嘴唇就发干了。我知道，在这个只有通过欺骗、逃避才能保持自由的世界里，在歌德充满智慧地概括为“奖章和头衔能避开人群的倾轧”的世界里，我这种人是多么的过时。但是，正是父亲对我的影响，以及他遗传给我的那种隐秘的骄傲迫使我回来的，我无意反抗。因为我要感谢他，那也许是我仅有的确切的财产——内心的自由感。

我母亲的出身和父亲不同，娘家姓是布瑞陶尔，是一个更国际化的家族。她出生在意大利南部的安科纳，从小就能讲意大利语和德语。当她不想让仆人们知道和我的外祖母或者姨妈谈话内容时，就会改说意大利语。年少时我就很熟悉意大利烩饭和当时还十分稀有的洋蓟了，以及

[1] 尼斯：Nice，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是法国仅次于巴黎的第二大旅游城市，也是全欧洲最具魅力的滨海度假胜地。



其他地中海特色美食。之后，每次去意大利，一下车就有种归家的自在感。然而我母亲的家族并不是意大利裔，而是有意变得国际化。布瑞陶尔家族最早是仿照最大的犹太银行家族经营一家银行，但是规模要小得多。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从霍恩埃姆斯，一个毗邻瑞士边境的小地方迁往世界各地。一些人去了圣加仑，另外一些人去了维也纳和巴黎，我的外祖父去了意大利，而舅舅则去了纽约。这种国际化的联系使他们更优雅，见识更广，具有了某种家族骄傲。家族里再没有什么小商人或者经纪人，有的只是银行家、经理、教授、律师和医生。每个人都会讲好几种语言，我清楚地记得他们在姨妈巴黎的房子里吃饭的时候，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是那么的自然。家族成员团结一致，当贫寒亲戚家的年轻姑娘到了要出嫁的年纪时，整个家族都会一起筹集一份颇丰的嫁妆，以防止她“下嫁”。作为一位工业家，我父亲很受尊敬，尽管嫁给他我母亲心满意足，但是她从不允许父亲的亲戚把自己和他们相提并论。这种出身“上流”家族的自豪感在所有布瑞陶尔成员中根深蒂固。后来，当家族成员对我示好时，他会屈尊地说：“你真是一个合格的布瑞陶尔家的人。”似乎在说，“你生对了人家。”

这种许多犹太人家庭自诩的高贵，在我和弟弟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有时会逗乐我们，有时又会惹恼我们。我们总是被告知这些是“体面”的人，那些是“不体面”的人。每个朋友都会被追查祖宗八代，看看是不是出身一个“上流”家族，并核查他的亲戚和家底。这种人分三六九等一直是每次亲密的社交谈话的主要话题，在当时看似是最可笑和势利的行为。因为所有犹太家族五十年或一百年前，时间或长或短都来自同一个犹太社区。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种对我们小男孩而言，似乎是一种虚伪的伪贵族拙劣模仿“上流”家族的概念，这正是犹太人生活最深远、最隐秘的倾向之一。人们普遍认为致富是犹太人唯一且典型的目标。没有什么比这种看法更离谱的了。财富对于犹太人而言只是垫脚石，一种达到真正目标的手段，绝不是真正的目标。犹太人真正决心要达到的目标是在精神世界上升到更高的文化层次。甚至是集中了整个犹太民族优缺点的东正教犹太人，也表现出将精神意志凌驾于物质追求之上。作为圣洁的人，研读圣经的学生在犹太人中获得尊敬比一个富人还要多一千倍。即使是最富有的人也宁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最穷的学者，而不是一个商人。人们不分阶级，都认为有文化的人地位最高，